

刘 琦

名士与解脱



名士与解脱

刘 琦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士与解脱/刘琦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1

ISBN 7-5063-1157-7

I. 名… II. 刘… III. 个人—修养—普及读物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423 号

名士与解脱

作者: 刘 琦

责任编辑: 王 析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15 千

印张: 5.25

印数: 001—10100 册

版次: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57-7/1·1145

定价: 10.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虚幻的憧憬	(7)
I 侃不完的玄理	(7)
II 虚幻的精神乐园	(14)
III 自误误人的长生药	(19)
第二章 酒杯中的慰藉	(32)
I 放纵求生存	(32)
II 任诞中的“自由”	(37)
III 麻醉了的生命意识	(39)
IV 把酒悟人生	(46)
V 浪漫的“酒仙”	(52)
VI 理性的豁达	(58)
第三章 何必丝与竹 山水有清音	(65)
I 自然与人性	(65)

I	现实的避风港	(69)
II	羁鸟归林的愉悦	(72)
IV	一生好入名山游	(76)
V	孤魂的归宿	(81)
第四章	依红偎翠的逍遥	(86)
I	失意的“寄托”	(86)
II	高楼红袖度年华	(91)
III	碧玉红笺写真情	(92)
IV	艳遇与诗名	(98)
V	浅斟低唱换词名	(102)
VI	现代名士的情与理	(108)
第五章	墨泼悲愤情	(114)
I	发愤著书	(114)
II	不平则鸣	(119)
III	激扬文字	(125)
IV	长歌当哭	(130)
第六章	抚琴长啸的寄意	(139)
I	啸歌识知音	(139)
II	幽愤发悲声	(143)
III	审美情趣化的人生意蕴	(148)
结 语		(154)

引 言

在中国古代，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便是名士阶层。他们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属于知识分子，但又是知识分子中优秀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人格形成上的诸多原因，这些敏感、多感而又善感的人们，几乎总是处于怀才不遇或抑郁难伸的境遇，人生抱负和人格理想常常与社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加之人生命运多有不测，名利场上，爱情之中，荣辱浮沉，生离死别，使得他们的心灵常常挣扎于痛苦之中。于是，寻求解脱不仅成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形成了以解脱为核心的名士人生文化。其中既有不少美好动人的故事，也有很多悲怆凄冷的传说。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虽然名士们的解脱经历都颇有些隔世之感，但历史是相延续的，人生是相通的，心灵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谈古代的名士，先要了解“士”。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简单地说，士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但这与今天的知识分子略有不同。余英时先生曾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在古今内涵上的差异，有过确切的阐释，他认为在西方，“知识分子”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而是指献身专业的同时，还深切地

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而在中国古代，情况有所不同。

士阶层在中国兴起较早，春秋战国时代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早期的士，社会地位在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并有一定的职务，后来随着礼崩乐坏，士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支文化精英，他们仍旧保持着为道而献身的传统。虽然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基础已远不如早期的士那样牢固，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都有很大的依附性，但在思想、人格上都是很自主的。因此，概括地说，士阶层在社会上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孟子语）。他们自觉性高，忧患意识强，有强烈的人格自主意识，同时，也想要为国家及民众服务。这就是孔子说的“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内涵。但是士阶层所遵循的“道”，往往缺少具体的形式，他们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代表的“道”来，此外便无其他保证。因此，在士阶层，“穷达”之说盛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地说，他们很注重个人修养和人格的完善。于是，士阶层名家辈出，代表着传统精英文化的基本特征。

士的思想是多层次，多元化的，但基本点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其具体表现为“以道己任”的价值取向。在孔子看来，“士”的价值取向应以“道”为最后的依据，“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笃信善学，守犯善道”（《论语·泰伯》），“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所谓的“道”，源于中国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由此而衍生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这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以此要求，士这一阶层的人生立足点就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得失而站在对整个社会的关怀这一基点上，进而发展为“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些已经成为古代名士的人生准则。因此，在他们面对人生选择时，总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表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们一方面关怀社会，品评时政；一方面不断以传统的礼乐来约束自己，修身养性，构建自己完美的人格。如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孔子走入社会时，正是鲁国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仕途难通的过渡时期。于是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聚徒讲学，宣传儒家道统，推行他的“仁义礼乐”、“德政”的主张。孟子为了行道，曾游事于齐宣王、梁惠王，企图实现他的“仁政”理想。虽然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重用，但是他的思想体现了封建时代进步思想家的战略眼光，他所主张的民本思想，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提出了施仁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还有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如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牧、唐宋八大家、王冕和“扬州八怪”等等，这些名士充满了人生的忧患意识和关心民众的社会良知，作品中也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意识和平等精神，以及知识分子关心社会与关心时政的进步性。

当然，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只是知识分子思想中一个主导的方面，并非是他们思想的全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讲的是入世与出世的两种不同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古代知识分子，即便是名士，可他们没有施政的权力，充其量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权门贵族的说客。所以他们在社会急剧变化与动荡面前，很难实现其儒家的“兼济天下”的理想，用世之心往往受到严重挫伤，从而处于心理失衡的痛苦无望状态。这时，儒家的“独善其身”的思想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巨大的效应。所谓的“独善其身”与道家的“遗世独立”、崇尚自然相吻合。名士们便把儒学中的“自我完善”、“为己之学”与道家的“清心寡欲，养气守神”，和佛教中的“我心即万物”的本体论与自心参悟的认识论相结合，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即一种人格的完善、恪守伦理纲常的自觉意识和清静平和、自然适意、遗世独立的生活情趣与解脱尘世烦恼的生活方式。这样，他们就成为具有雅闲的生活和较高文化层次的精神追求，又有自觉追求人格完善，恪守伦理纲常的文化意识的一个名士阶层，他们的言行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了。

我们之所以用这些文字来剖析古代名士的社会地位、文化心态和人格蕴涵，就是想以此揭示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历代的名士尽管每个人都有个人面对的挫折和痛苦，但在排遣精神压抑和解脱心灵苦闷上仍有着颇为一致的方式和途径。这就为我们从一定的角度来概括名士的解脱提供了可能，粗略地说，自汉末以来，古代名士主要通过六种生存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心理自救。

一是谈玄、吃药、求仙，这是古代名士文化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内容。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名士云集的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社会黑暗，危机四伏，名士们为求保命而不得不从与现实直接对抗的“清议”中撤退下来，而他们又不愿

与统治当局同流合污，于是便到《老子》《庄子》和《周易》中寻找精神寄托，在虚幻的玄理、无望的求仙和自误又误人的吃药中来解脱精神的苦闷，以排遣心灵的压力。尽管这些途径使一些名士获得了某一方面或一段时间的心理慰藉，但从根本上说，绝大多数名士并未从中获得痛苦的解脱，或者说只换来了一些虚无飘渺的感觉。

二是饮酒。这似乎是古今中外一切痛苦者的救命稻草，中国古代的名士们更是沉迷其中。然而酩酊不省的麻醉与带有理性的以酒消愁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前者是一种逃避，而后者则是一种智者的解脱，这基本上代表了名士与酒的两重关系，因此说前者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人格的自泯，而后者则更接近于人格的完善。

三是怡情山水，投身田园。通过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淡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挫折和打击，以宣泄心灵的痛苦和压抑。中国古代名士亲和自然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怡情型和宣泄型。前者更具主动性，侧重人性与自然的协调，以人性的纯朴与现实的丑恶相抗衡。后者往往是在现实挫折的重压下，投身于自然之中，在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展示人性的真善美，抨击社会的不平和现实的丑恶，以此达到内心积郁的宣泄。

四是依红偎翠。这种倾向在魏晋以后几乎成为历代名士所热衷的解脱之道，或许只有在与人的交往中，只有在肉体的沟通中，人才能获得最充分的精神解脱。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最简单的表象，往往蕴含着最复杂的原因，在名士们的依红偎翠中，理性与感性、真情与假意、奋争与颓废、情爱与性欲等等往往掺和混杂在一起，需要对具体的人作出具体的分析。

五是激扬文字。这对于每位名士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中国的诗文，不仅仅是一种创作，尤其对于名士来讲，诗文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此，每当人生遇到坎坷，心灵蒙受苦闷，诗文往往是他们最直接、也最富文化价值的解脱途径。

六是音乐，再扩大些说便是琴、棋、书、画。这些对于名士来说，既是一种修养，一种技艺，也是一种人生的活法。名士们在其中展示自己的人格，同时也在不断地陶冶自己的性情，从而也创造出了高雅的消闲文化。

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而又复杂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名士的解脱都是一个痛苦心灵的挣扎历程，本书所归纳的六个方面虽具备相对的典型意义，而真正有价值的是最具个性化的人生经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汉魏时代，名士明确指那些鄙视礼法，我行我素，名闻天下而又拒不出仕的人，后来这个概念越来越宽泛，以至竟指一切名人。本书既要照顾到名士的原始本义，又要避免过于偏狭，因此只好兼顾到人物的名气和文化地位，又不要失去人物作为一个“士”即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这实在是难以精确把握的一件事。但愿这样能从总体上勾勒出名士们的人格和精神风貌，使我们从名士的心理自救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章 虚幻的憧憬

I 侃不完的玄理

东汉 中叶以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举世震惊的事件。那是在汉桓帝时，宦官把持了朝政大权，西羌民族不断入侵中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太学生出于对朝政的关心和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便聚集在京师，议论和品评朝政，想藉此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开明政治的实施。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太学清议”。《后汉书·党锢外传》序上对此作了记叙：“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用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太学生们有自己的组织和领袖，他们常常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当时的领袖是李膺和郭泰两人。李膺当时是司隶校尉，职掌纠察京师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相当于州刺史。他不同意宦官专权的局面，便与太学生郭泰结交，组织清议，抨击宦官集团。太学生很敬佩和推崇他们俩人，因李膺字元礼，所以太学生都称他为“天下楷模李元礼”。后来，有人勾结宦官，诬告他们是“诽讪朝廷”，李膺等二百多人被捕入狱，虽然后

来被释放，但终身不能做官。李膺还遭到了终身禁锢，郭泰从此回归乡里，闭门教授门徒，这次事件，在历史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即位以后，外戚宦武专权，他起用了当年清议的“党人”，并且谋诛宦官。李膺也被起用为长乐少府。没想到诛杀宦官的事情泄露出去，他们的谋划失败了，“党人”中有六七百人被囚禁，一百多人被处死，李膺死在狱中，而且株连了五族。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这两次事件，在当时历史上影响很大，对太学生的言行是惨重的打击。他们已经认识到对现实的关怀，威胁到了性命，可是儒家的立身原则使他们又不愿意任人宰割。到了魏晋时期，司马氏掌权之后，更为昏庸残暴，滥杀无辜，当时的太学生，后来的名士，许多人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残酷的现实使名士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越来越深。为了摆脱内心的苦闷和不平，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超脱。道家“消极避世，任情自然”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名士的这种心态，于是他们便开始谈论老子、庄子的思想，研究《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著作。因为它们的内容深奥渊博，含义玄妙，所以名士们称它们是“三玄”，对它们的研究与解说就形成了专门的学问，这就是“玄学”。研究“三玄”的最直接、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谈玄”。名士们把对现实的关注转移到只谈论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等等的玄远哲理，逐渐形成了魏晋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和哲学体系，也成为魏晋时期名士思想解脱的一种独特方式。

谈玄者中，也有自己的领袖人物。魏正始（240—248）中，何晏和王弼是谈玄的主要人物。他俩儿常与士人集于林下，高谈《老子》和《庄子》，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论

说》中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这种谈玄的盛况被称为“正始之音”。

何晏与王弼，玄学造诣很深。王弼还不到二十岁时，两人初次见面，就为玄学开展了一场论争。《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②皆一坐所不及。

王弼少年聪慧，精通老庄之学，而又能言善辩，何晏早有耳闻。所以一见面，何晏便向王弼提出了问题，而王弼则以善辩的才能驳倒了何晏，成为名士的一大轶闻。

起初谈玄还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后来就渐渐地脱离具体内容而趋向抽象的玄理，到了两晋，更崇尚玄虚，达到了谈玄的极盛。在玄言哲理中，他们完全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沉浸到虚无主义的境界中去了。到后来，清谈玄理竟然成为时尚，文官武将，佛门高僧，都愿意与名士往来，共析玄理。一般是先有一个中心论题，然后再互相论辩。《世说新语·文学篇》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场面：

① 古代男子二十岁时束发，行冠礼，谓成人之意。弱冠：还未行冠礼，指还不到二十岁。

② 自为客主：自难自答的意思。客主：犹言辩难。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彀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否？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锋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支遁、许询、谢安、王濛都是西晋时谈玄的主要人物。在谈玄中，谢安提出了谈论的主题，即《渔父》，让大家阐明旨义，支道林作了七百言的长篇论谈（谈的内容如今已无迹可寻），当时博得了众人的喝采。紧接着，大家各抒己见。最后谢安粗略诘问，然后自叙其意，做了深入解说。这只是一次谈玄的情景，其热烈而又认真的气氛可以窥见一斑。后来有人评论说：“有此叙致，一日风流，千载可怀。”

谈玄的内容后来渐渐扩大了，除了“三玄”的哲理外，涉及到许多其他的论题。比如圣人“无情”还是“有情”，最早何晏提出了“圣人无情”，王弼则认为“圣人有情”，不过能“应物而无累于物”。这个论争在《世说新语·文学篇》里也有记载：

僧意在氐官寺中，王荀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这个谈论，掺加了佛义。其“圣人”指“佛”，王荀子认为：佛无情，但使用它的人有感情。

何晏的“圣人无情”被王戎所接受。王戎丧儿，悲不能自胜，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资，正在我辈。”

《世说新语·文学篇》还记载了一次论谈：

旧云：王丞相过江右，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都是嵇康的论文。在《声无哀乐论》里，嵇康说：“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乎？”嵇康认为声音虽然有节奏和法度，但它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哀乐是人的情感，声音与之无关。所以他得出“声无哀乐”，“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的结论。

嵇康又相信神仙，讲究养生，在《养生论》中，表现了他追求逍遥和游仙的思想。他认为养生，在于“清虚静泰，少和寡欲”，只有超越了烦恼，才能达到养生久寿的目的。这既是嵇康的理想境界，也是当时名士共同的思想特征，这也成为名士谈资的一项内容。

在谈玄中，名士们还很注重言辞音调的美妙，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感情融入言语之中，而且更讲究言语表达上的美巧与善辩。《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载的支遁、许询、谢安等共集王家谈论《渔父》的“叙致精丽、才藻奇拔”的言辞之美与“才锋秀逸，既自难干”的巧辩能力，就足以见出他们对言辞隽语的追求。《世说新语·赏誉篇》还有一段记载：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

从东海王对儿子的教诫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谈玄中，除了玄理之外，更注重音辞隽语的体会。他们讲究的是音调的美妙与和谐，在玄理与音辞之间，他们得到了性情的陶冶和一种心理的满足，不再为现实的黑暗而烦恼，从而得到了精神上的真正解脱。

名士对玄理的研究，除了论谈之外，还有著述，有文章。何晏著了《论语集解》，他用老庄的思想来解释儒家学说，把儒学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王弼为《老子》这部书做了注释，注释中讲“无”，讲“道”，讲“宇宙自然”等，进一步阐扬了老庄的玄理。当时，老子、庄子著作的注释和研究已经成为晋代封建士大夫的必修课了，以后史传上称赞某某人是否有学问，往往以是否精通《老子》、《庄子》和《周易》为标准。由此可见，谈玄已经成为魏晋名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尊贵与绝俗的象征。

谈玄的结果，影响到了当时的学术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也影响到名士的思想、政治态度、生活态度及生活情趣。

首先是学术思想的变迁：经学被玄学化了，开启了一代新的文人士风。自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生多宗阴阳，以穷经为业。解经时，杂糅纬，崩离繁琐，由此发生了流弊。《汉书·艺文志》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